



考古手铲下的长安 不只是都城史

王小柔



当刘庆柱在 2025 年的暮春写下《盛世长安》的序言时,这部历经三十余年学术积淀的著作,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历史叙事。从 1988 年《长安春秋》的初版,到 2014 年“丝绸之路:长安—天山廊道的路网”申遗成功后《地下长安》的增补,再到如今《盛世长安》的升华,作者以考古学家的严谨、历史学家的深邃与文学家的笔触,将汉唐长安的城郭、宫苑、市井、丝路熔于一炉,不仅还原了一座都城的盛世图景,更解码了中华文明的“连续性、创新性、统一性、包容性、和平性”。这部 25 万字的著作,既是一部都城考古的实证报告,也是一部文明演进的文学华章。

文明的物质根基指向历史纵深

“一方水土养一方文明”,《盛世长安》开篇便将长安置于关中盆地的地理坐标系中,揭开了盛世都城的先天密码。南倚秦岭、北临北山,东据函谷关、西扼散关,南守武关、北控萧关,关中盆地“四塞以为固”的地理格局,使其成为“控驭天下”的战略要地。而“八水绕长安”的水文优势——渭、泾、灞、泾、沣、镐、潏、涝八条河流如银带环绕,既为都城提供了充沛的生产生活用水,又通过灌溉造就了“九州膏腴”的沃野,让关中自古便有“天府”“陆海”之称。作者通过考古数据与文献记载的互证,指出关中耕地虽仅占全国三分之一,人口不及三成,财富却占天下五分之三,这种经济基础正是周、秦、汉、唐定都于此的根本前提。

如果说地理是文明的摇篮,那么考古则是唤醒历史的钥匙。作为汉长安城考古队原负责人,刘庆柱将数十年的田野考古成果倾注于书中,让“地下长安”的每一处遗存都成为文明的实证。从蓝田县公王岭距今 115 万年的直立人化石,到半坡、姜寨遗址的仰韶文化村落;从秦咸阳宫一号宫殿的高台建筑遗址,到汉长安城“一门三道”的城门形制;从华仓遗址的“百万石仓”瓦当,到西市的铸币作坊与陶俑窑群,每一项考古发现都在填补历史的空白。书中对汉函谷关“关”字瓦当的细致描述,对秦咸阳宫建筑复原图的精准解读,对华仓防潮通风结构的专业分析,既展现了考古学的严谨之美,又让读者得以触摸历史的肌理。

尤为难得的是,作者将地理环境与考古发现相结合,揭示了文明延续的物质基础。渭北塬地的高亢平坦、土层深厚,使其成为汉唐帝陵的集中分布区,咸阳原上的九座西汉帝陵与北山南麓的关中唐十八陵,构成了“陵墓如都”的文化景观;终南山作为长安南部的天然屏障,不仅是宗教修行的圣地,更孕育了樊川的富庶与名寺古刹的繁盛。这种“山河形胜”与“人文遗存”的相互印证,让长安的文

明根基显得愈发坚实而厚重。

都城规制是空间表达的历史传承

都城是国家的缩影,更是文明基因的空间载体。《盛世长安》以大量笔墨剖析汉唐长安城的规制布局,揭示了中华文明“中”与“中和”的核心思想如何通过建筑形态代代相传。汉长安城的太极宫居于宫城中央,东宫与掖庭宫分列东西,这种“择中建宫”的布局,继承了商代洹北商城的规制,又为北魏洛阳城、宋开封城、元明清北京城所延续,形成了贯穿两千余年的都城营建传统。作者特别指出,这种“居中”理念并非简单的地理对称,而是“国家至上”政治思想的空间表达,体现了中华文明对“统一性”的追求。

从汉长安城的“一门三道”到唐长安城的“一门五道”,看似简单的城门形制演变,实则是文明“创新性”与“连续性”的生动体现。汉代城门的“一门三道”源于战国楚国纪南城,却形成了定制并传承后世;唐代将其发展为“一门五道”,进一步强化了都城的等级秩序与国家认同,这种规制最终被天安门继承,成为中华文明延续性的鲜活例证。书中对长安宫苑中“水池”制度的梳理同样精彩:从汉代未央宫的沧池、建章宫的太液池,到唐代宫城的四海池,再到元明清的中南海、北海,这种以水池象征“四海”的布局,不仅体现了古人的宇宙观,更强化了“大一统”的国家观念。

都城规制的传承,本质上是文化认同的延续。大金王朝海陵王定都燕京称“中都”,元大都、明清北京城承袭“择中建都”理念,即便统治者来自不同民族,却都对中华文明的核心规制予以认同,这正是“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”形成的历史渊源。作者通过考古实证与文献记载的互证让我们看到,长安城的每一处布局、每一座建筑,都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,这种价值通过空间形态的传承,成为维系文明不断裂的精神纽带。

长安盛世里的精神气象

盛世长安的辉煌,既源于坚实的经济基础,更得益于繁荣的文化生态。《盛世长安》详细梳理了汉代长安的经济体系,从水利工程的兴修到铁农具的普及,从手工业的精进到手工业的繁荣,展现了盛唐经济的内生动力。郑国渠、白公渠、漕渠、龙首渠等水利工程的修建,构建了关中地区的灌溉网络,使渭北平原亩产高达 255 千克,远超当时普通农田产量;长安城郊出土的 85 件窖藏铁农具,种类齐全、形制统一,反映了铁农具生产的标准化与普及化;官营的织室与民营的纺织作

坊并存,陈宝光妻子发明的“一百二十综、一百二十蹻”提花机,织出的蒲桃锦、散花绫价值万钱,彰显了手工业的精湛技艺。

商业的繁荣则让长安成为全国的商品枢纽。东市与西市东西并列,形成“井”字形道路网,东市以商业贸易为主,商品琳琅满目,造就了无数富商巨贾;西市以手工业生产为核心,铸币、制陶、冶铸作坊密集,直属中央管辖。书中引用班固《西都赋》“人不得顾,车不得旋”的描述,生动再现了长安市场的熙攘繁盛。而华仓作为国家级粮仓,东西长 1120 米、南北宽 700 米,其防火、防盗、防潮的设计,体现了西汉时期高超的仓储技术,也印证了长安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地位。

经济的繁荣催生了文化的鼎盛。汉武帝创建的太学,从最初的 50 名博士弟子发展到成帝时的 3000 人,校舍达万间,成为全国的教育中心;未央宫中的天禄阁、延阁等皇家图书馆,藏书达三万卷以上,刘向、刘歆父子在此编纂《七略》,开创了中国目录学的先河。文学方面,司马相如的《上林赋》、扬雄的《甘泉赋》,以华丽的辞藻赞颂长安的壮丽与帝国的强盛;艺术方面,乐府的设立推动了音乐的发展,李延年根据胡乐改编的 28 支名曲流传后世,西域传入的箜篌、箜篌、琵琶等乐器,与传统乐器交融,形成了独特的乐舞风格;美术方面,宫室壁画题材广泛,霍去病墓前的石雕群古朴苍劲,昆明池畔的牛郎织女石刻静默伫立,展现了汉代美术的雄浑气象。

这种经济与文化的良性互动,构成了盛世长安的精神气象。太学中“雍容揖让”的学术氛围,市集上“摩肩接踵”的商业活力,宫殿里“钟鸣鼎食”的礼仪规制,共同塑造了长安开放包容、昂扬向上的城市品格,这种品格正是中华文明“创新性”与“统一性”的生动体现。

文明的包容气度与和平底色

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,长安自古以来就是一座国际大都会。《盛世长安》以大量鲜活的史实,展现了汉唐长安的中外交流盛况,揭示了中华文明“包容性”与“和平性”的鲜明特质。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,历经近二十年开辟丝绸之路,让长安与罗马这两个世界最大的都会得以联通。书中详细描述了丝绸之路的路线:从长安出发,经渭桥至咸阳,分两路西进河西走廊,再经新疆分北、中、南三路抵达中亚,这条通道不仅是商道,更是文明交流的桥梁。

长安城中,域外人士云集。藁街上的蛮夷邸鳞次栉比,匈奴使者、西域质子、波斯商人、天竺僧侣在此聚居;上林苑中的葡萄宫、平乐观专为接待外国贵宾而设,汉宣帝曾在此以角抵戏招待乌孙使者;匈奴休屠王太子金日磾官至桀侯,其家族七世内侍朝廷,彰显了汉朝对

异族人才的信任与重用。商品贸易的往来更是频繁,西域的明珠、文甲、汗血马、毛织品源源不断传入长安,长安市场上的胡商“富可比千乘王侯”;中国的丝绸、铁器、农耕技术、蚕桑养殖则通过丝绸之路西传,改变了西域的生产生活面貌,新疆的坎儿井便是对长安井渠技术的借鉴与创新。

文化的交流碰撞更显文明的包容。域外宗教传入长安,古刹名寺遍布城中,“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”至今仍是文明包容的历史佐证;西域的胡乐、胡舞与中原艺术交融,形成了长安乐舞的独特风格,百戏演出不仅深受百姓喜爱,更成为国宴招待外宾的重要形式。王昭君出塞的故事尤为动人,这位来自南郡的宫女,以大局为重远嫁匈奴,使汉匈边境安宁半个多世纪,她的子孙后代继续致力于民族友好,成为中华文明“和平性”的千古典范。

作者说,长安的中外交流并非单向的文化输出,而是双向的文明互鉴。西域的葡萄、苜蓿、胡桃、胡瓜等作物传入长安,丰富了中国的农作物品种;中原的礼仪制度、宫室建筑、服饰文化被西域各国借鉴,推动了当地的文明进步。这种“各美其美,美美与共”的交流模式,正是中华文明“包容性”的核心体现,也为当今世界的文明交流提供了历史启示。

长安为镜照见千年归途

长安从来不是一座静止的城。它是周丰镐京的“文王灵台”,是秦咸阳宫的“高台连宇”,是汉未央宫的“沧池映日”,是唐大明宫的“麟德殿宴”。它的每一寸土地,都埋藏着文明的密码。书中那些被考古铲唤醒的遗存:汉函谷关的“关”字瓦当,仍带着丝绸之路第一关的风霜;华仓的“百万石仓”拓片,还留存着天下粮粟的醇香;西市陶俑窑里的裸体陶俑,似在等待着帛衣重披;“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”的斑驳刻痕,记录着文明相遇的温柔。这些碎片,拼凑出的不仅是一座都城的盛世图景,更是一个民族“于延续中创新,于包容中统一”的精神轨迹。

曾有人问,为何是长安?为何这座城能成为周秦汉唐的都城,成为丝绸之路的起点,成为中华文明的“盛世标本”?《盛世长安》给出了答案:它的地理格局,是“四塞以为固”的战略纵深,是“八水绕长安”的滋养馈赠;它的都城规制,是“择中建宫”的秩序传承,是“一门五道”的等级升华;它的文明气度,是张骞出使西域的“万里凿空”,是王昭君出塞的“琵琶和鸣”,是胡商云集西市的“金玉互通”。长安的伟大,从不是独善其身的繁盛,而是以“海纳百川”的胸怀,成为文明交流的枢纽——正如书中所写,唐太宗被尊为“天可汗”的荣光,不在铁骑征伐,而在“蕃臣石像立乾陵”的臣服;长安成为国际大都会的底气,不在宫阙巍峨,而在“胡乐与雅乐共奏”的和谐。

如今,汉长安城的残垣已没入暮色,唐曲江池的烟波已化作平畴,但长安的魂,从未消散。当我们在西安碑林看到“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”,在咸阳原触摸西汉帝陵的封土,在昆明池畔凝望牛郎织女石像,便能读懂《盛世长安》的深意:文明的延续,从不是冰冷的文献记载,而是“具象”的文化基因,是“居中”理念在紫禁城的回响,是“井渠”技术在坎儿井的延续,是丝绸之路在当代“一带一路”的新生。刘庆柱以数十年考古生涯为基,写下的不仅是一部都城史,更是一部“文明说明书”,让我们看清: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历经风雨而不绝,正在于它能把“连续性”化作根基,把“创新性”化作活力,把“包容性”化作胸怀,把“和平性”化作底色。

长安为镜,映照的从来不是逝去的辉煌,而是未来的方向。当暮色掠过汉长安城的夯土墙,渭水波里仍倒映着两千年前的月光;当晨光照亮西安的城墙,现代楼宇间仍能寻见唐长安的坊市脉络。这部《盛世长安》,便是架在古今之间的一座桥,桥上似有张骞的驼队,有昭君的琵琶,有考古学家的手铲,也有我们探寻文明根脉的脚步。

终究,长安不是一座城的名字,当我们用《盛世长安》一书解锁长安的过往,也便读懂了中华文明的来路与归途。

《盛世长安》的深意,不仅在于还原一座都城的历史风貌,更在于通过长安的盛世图景,让我们重新认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,汲取当代文化自信的力量。书中通过大量考古实证与历史分析,证明中华文明的“连续性”并非简单的重复,而是在继承中创新,在创新中传承;“统一性”并非强制的同化,而是基于文化认同的自然凝聚;“包容性”并非被动的接纳,而是主动的互鉴与融合;“和平性”并非软弱的妥协,而是“协和万邦”的智慧;“创新性”并非无根的标准,而是立足传统的突破。

在当今世界面临文明冲突、文化隔阂的背景下,《盛世长安》所展现的文明特质具有尤为重要的现实意义。长安作为国际大都会,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接纳不同民族、不同文化,通过和平交流实现文明互鉴,这种模式为当今世界的文明对话提供了历史范本。而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历经五千年而不断裂,正是因为其“连续性”中蕴含着强大的文化基因,“创新性”中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,“包容性”中拥有着广阔的胸怀。

刘庆柱作为资深考古学家,始终坚持“以考古实证历史”的学术立场,《盛世长安》中的每一个观点都有考古发现支撑,每一段描述都有文献记载佐证。看罢此书,汉唐长安的盛景似在眼前:渭水汤汤,承载着漕运的船只往来不绝;宫阙巍峨,见证着朝会的庄严与礼仪的繁盛;市井喧嚣,回响着中外商人的讨价还价;丝路漫漫,铭刻着文明交流的足迹。

辛亥革命前夕的风,掠过西南的山野密林,拂过蒙古的戈壁荒漠,也吹动了一位美国女教授的衣角。1911 年,年过半百的伊丽莎白·肯德尔告别韦尔斯利学院的讲台,带着一只爱尔兰猎犬、一台照相机和对东方文明的赤诚向往,踏上了一段穿越中国腹地的旅程。她避开通商口岸的西式喧嚣,选择了一条“离经叛道”的路径:从云南入境,经四川、湖北北上,终至蒙古戈壁与西伯利亚铁路相接。这段历时半年的慢行,被凝结成《中国漫行记:从山野密林到戈壁荒漠》一书,成为百余年后我们回望那个剧变时代的珍贵镜鉴——镜中既有山河的灵秀与苍茫,更有人性的坚韧与温暖。

伊丽莎白·肯德尔的旅行,从一开始就带着反常规的勇气。作为美国“七姐妹”女子学院的资深教授,她本可安享舒适与尊荣,却以 60 岁高龄选择深入动荡中的中国内陆。彼时的中国,正处在平等条约阴影与革命浪潮酝酿的夹缝中,西方世界对这片土地的认知多源于通商口岸的片面观察,充满了误解与偏见。而伊丽莎白·肯德尔拒绝被这些刻板印象束缚,她在自序中写道:“要见识东方,就必须避开已半欧化的城镇与通商口岸,远离旅馆铁路的舒适,准备接受鲜有人至之径的各种苦乐。”这份清醒的认知,让她的旅行从起点就超越了普通观光,成为一场对真实中国的探寻。

她的行程充满了现代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与浪漫。或坐船顺流而下,或骑马穿行村寨,或徒步跋涉于羊肠小道,夜晚有时只能借宿猪圈、铺稻草而眠,有时在溪边打盹度过长夜。随行的只有若干随从、忠诚的翻译老王,以及始终相伴的爱尔兰猎犬杰克。语言不通没有成为阻碍,文化差异未曾引发隔阂,她以旅行者的勇毅和文学家的敏锐,捕捉着沿途



旷野留痕 百年中国的回响

王晨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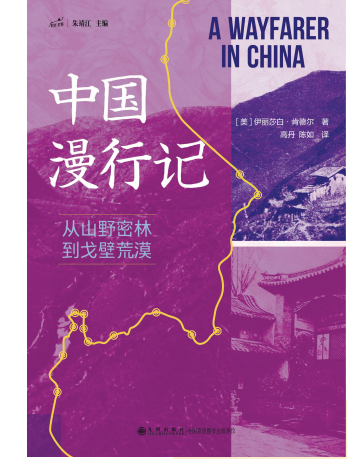
的每一处风景与每一张面孔。在云南的深山里,她见识了村寨的淳朴民风;在成都平原,她感受了农耕文明的厚重;在峨眉山巅,她触摸了宗教圣地的静谧;在蒙古草原,她体会了游牧民族的豪迈。这些经历没有被写成枯燥的游记,而是化作了饱含温度的文字,让百余年后的读者依然能感受到当时的风、当时的光,以及当时人们眼中的善意。

在那个社会剧变的年代,战争的阴影、外来的压迫并未磨灭中国人骨子里的善良与坚守。她在沿途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:慷慨相助的欧洲商人与传教士,友善热情的中国村民,尽职尽责的军官与银行职员,还有那位集翻译、厨师与总管于一身的忠诚随从老王。他们或许身份各异、境遇不同,却都以最真诚的方式对待这位异国旅人。在四川边远之地,得知美国政府退回部分庚子赔款的当地人,对她格外友善;在蒙古草原上,蒙古族朋友们用热情消解了她旅途的疲惫。伊丽莎白·肯德尔以旁观者的客观与亲历者的共情,记录下这些温暖的瞬间,打破了当时西方世界对中国人“沉默寡言、难以捉摸”的刻板印象,让我们看到了剧变时代里,中国人民最本真的模样。他们或许生活困顿,却始终保持着待人的热忱;或许面临动荡,却从未丢失内

心的尊严。

作为一部百余年前的旅行纪实,《中国漫行记:从山野密林到戈壁荒漠》的史料价值同样不可估量。书中收录的约 40 幅珍贵老照片,是伊丽莎白·肯德尔沿途拍摄的实景记录:有西南村寨的茅草屋,有长江上的旧式帆船,有蒙古草原的游牧帐篷,还有身着传统服饰的普通百姓。这些黑白影像没有经过刻意修饰,真实再现了辛亥革命前华南、华中、华北各地的风土人情与自然风貌,成为不可多得的视觉史料。更难能的是,书中还附有作者的行旅路线图,清晰标注了从云南到蒙古的行程轨迹,为研究近代中国的地理与社会提供了鲜活的参考。这本书以人类学的视角观察不同地域的文化差异,无论是西南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,还是蒙古草原的游牧文化,都在书中得到了生动呈现,为读者打开了了解近代中国多元文化的窗口。

伊丽莎白·肯德尔的文字兼具学者的严谨与文学家的灵动。她出身学术世家,先后在德、法、英等国求学,深厚的学术素养让她能以更广阔的视野观察中国。在描写峨眉山圣地时,她既记录了宗教仪式的庄严,也探讨了佛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承;在穿越成都平原时,她既赞叹农耕文明的发达,也关注百姓的



《中国漫行记:从山野密林到戈壁荒漠》, (美) 伊丽莎白·肯德尔著,九州出版社 2025 年 8 月出版。

生活疾苦。她的文字不堆砌华丽的辞藻,却带着追问的描写,让风景不再只是风景,而成为历

史与文化的载体。同时,她的文字又充满了共情力,在记录住猪圈、睡稻草的艰辛时,她没有抱怨,反而从中发现了乐趣;在面对沿途的围观与好奇时,她没有反感,反而感受到了中国人的友善与包容。

伊丽莎白·肯德尔写道:“我深知一切皆有价值。短短半年远不足以了解一个陌生的文明,但得见一个伟大的民族生活于其家乡,安居乐业,其乐融融,实属庆幸。”她的旅行初衷并非为了学术研究,而是“仅仅想收获对中国及其人民的印象”,这种纯粹的初心让她的观察少了偏见,多了真诚。她发现,尽管“东西有不同”,但“最为重要的乃是人之本性,而无论世界何地,人类本质均大同小异”。这种对人性本质的洞察,让这本书超越了时代与地域的界限,在百余年后的今天依然能引发读者的共鸣。当我们读到她对中国旧貌的珍视与不舍,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旅人的所见所闻,更是人类共通的对未知的好奇、对善良的向往、对家园的热爱。

《中国漫行记:从山野密林到戈壁荒漠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,一种不带功利、不抱偏见、纯粹以共情之心观察历史的视角。伊丽莎白·肯德尔用她的脚步丈量了百余年前的中国大地,用她的文字记录了一个民族在剧变前夜的坚守与从容,用她的相机定格了那些即将消逝的风景与面孔。这些文字与影像,如同散落在时光旷野中的星辰,历经百余年依然闪耀着温暖的光芒。

百余年光阴流转,伊丽莎白·肯德尔笔下的中国早已换了人间,但那些关于山河、关于人性、关于文明的思考,却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。《中国漫行记:从山野密林到戈壁荒漠》就像一位沉默的见证者,在时光的长河中静静伫立,等待着每一位读者走进它,读懂它,从中汲取穿越岁月的力量与温暖。